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五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编者的话：这是一篇对二七厂工人造反派领袖的访谈。

“文革”前，在官方宣传中，毛刘党国工农兵一体。但实际上，毛刘党国已陷于分裂，工农兵却蒙在鼓里。“文革”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上层的分裂导致了下层的混乱。

但在运动之初，要促使广大干群“觉悟”，并非易事。如上所述，党是铁板一块，质疑其中任何一项，无论是领袖、组织、路线等等都是反党。这个原则不但被党的理论，也被此前的“反右”运动所证实。在那次运动中，人们得到的认知是，不但党的领袖和党中央不容质疑，就连党的基层组织和领导甚至普通党员也不容质疑。但这一回，领袖和领袖，“路线”和“组织”，自己跟自己干起来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最先“觉悟”的不只那些“事先打了招呼”的，不只那些不满分子，还有像徐铠这样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按理说他一帆风顺，前途无量，不应有什么不满。但他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并且勤于思考。而这一思考，就不得了了，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多数工人阶级（尽管是先进阶级）仍然后知后觉。就在徐铠们冲锋陷阵之时，他们还陷在旧观念中不能自拔。有鉴于此，运动的发起者不光要煽风于报纸，还要点火于基层。有如希腊神话故事，天上诸神斗法，地上人人反对人人：领导斗群众，群众斗领导，工作组斗群众，群众斗工作组，工作组斗领导，领导斗领导，群众斗群众，人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犯了错误，昨天自己让别人写检讨，今天别人让自己写检讨，没个准谱。有人也许是“反右”的印象太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长远地看，这样押宝也没错，“路线”毕竟活不过“组织”。

那么，当时的“组织”究竟是谁的？毛的判断是“走资派”的，因此需要“夺权”。可以说，“文革”是一场最大的“非组织”活动，毛就是这场“非组织”活动的组织者。“组织”的悖论就在于，它的领袖不受“组织”的制约。

“文革”就是这一悖论的体现。

但即便是“文革”这种“非组织活动”，也是离不开“组织”的。换言之，有些地方是不能乱的，至少不能全乱。比如军队和工农业生产之类。这些是革命的“组织保障”和物质基础，否则“文革”别说十年（有说三年），一天也混不下去。

二七厂的“文革”就很说明问题，即使在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也没有停产。工人与学生不同，不干活就没饭吃，所以革命只能是业余的。就像当时的标语口号所说，“革命生产两不误”。而在别处引发流血的“夺权”行动，在二七厂却波澜不惊，连象征性的抵制都没有。颇有趣味的是，为保持生产秩序的连续性，有些原先的领导没有被撤掉，徐铠先生的说法叫“留用”。他想到

的是四九年以后对旧社会人员的“留用”。似乎是又一轮的改朝换代，推翻的都是“资产阶级”——只不过是党外党内之分。这显然是个错觉。

另一个相关的错觉是工人阶级终于掌权了。这一错觉并非始于“文革”。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宣布新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云云。看上去很美，却不过镜花水月。当你俯身细节，一切就消失不见：阶级之上还有先锋队，先锋队之上还有领袖……总之，遍身罗绮者，都不是养蚕人。

到了“文革”好不容易才搞清楚，原来“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无产阶级要“真正”掌权——“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而二七厂的实例却显示，工人阶级一旦夺了大印，要“领导一切”的时候，又派来了军管会。这又让徐铠想起了解放初期的“军管”，不是个好词儿。前有工作组，后有军管会。“新三民”（工农兵）之首的“领导阶级”却要受“新三民”之末的兵来领导——领导阶级总是叨陪末座，就好像在“工人阶级”和“领导一切”之间，总隔着一块玻璃天花板。

至于把工人领袖徐铠们调往市里，更让人想起把齐天大圣调离花果山往天庭任职的故事，在官场中这叫“明升暗降”。我们很期待徐铠先生接下来的故事，看看他的命运是不是跟弼马温一样。

我在二七厂的造反经历 徐铠口述 李宇锋整理

口述人：徐铠

采访、整理：李宇锋

参加者：李阜生

口述时间：2004年10月14、15日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我们知道您在“文革”中是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以下简称“二七厂”）的造反派头头，后来是北京市工代会的负责人之一，并任市革委会常委，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徐铠（以下简称“徐”）：我从简历上说吧。我是一九四三年生人，是战火烽烟的时候诞生的吧。

我是河北涿州人。涿州自古人杰地灵，出过很多历史名人，比如：刘备，张飞，赵匡胤，酈道元。另外，还有很多诗人、文人。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在我父亲没出生之前我祖父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很苦。我父亲十几岁就学徒当店员，是杂货铺，卖副食卖茶叶。后来又转到卖布，给人家站栏柜柜，“白天站栏柜柜，晚上拉排子车。”我母亲生了我们十一个（孩子），就落下两个姐姐和我。

我上学是在涿州，一九五七年高小毕业，之后上过一年初中。五八年八月十五号我就考到了城内东大街小学铁道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技工学校，那年我十五周岁，是招收的年龄最小的极限（最大的极限是二十五周岁），我们老班长是志愿军，他二十五周岁。所以我是个小孩儿啊，那时候净跟老班长、老大姐们开玩笑，都拿我当孩子。

学习了两年。毕业分配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铸工车间，先做翻砂，做干膜。就是把木模型放在铁砂箱里头，做出来以后，把模型敲出来，上涂料，入火窑烘干，出来以后紧固砂箱，用铁水浇铸。劳动强度大，工人也豪放——越是劳动强度大的，工人越有释放压力的方式。说话声音大，反应也是直来直去，简单地说就是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不考虑后果，这就是重体力劳动培养出来的性格。整个工人阶级也是这样，组织性纪律性强。比如上班有两遍笛声，那笛声就像火车拉的那个笛，八点上班，七点半一次预备笛（那笛声能传到方圆十几里，因为厂子也大），再一拉，八点整开始工作，全厂一盘棋，那时候的工人没有迟到的。

李：您那车间多少人？

徐：我去的时候不到一千人，后来六一年、六二年下放了一些，因为“三年暂时困难”，农村出现了饥荒，有一个下放的指示，支援农业，好多农民子弟被动员回乡，我们车间剩了五百多人了。后来不是又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吗，有一部分当兵了。大部分是回乡了。

李：您当时在车间里头显眼吗？

徐：不显眼，就是技校里的一个小毕业生，学徒工，还不如人家学徒工呢。学徒工两年，我们技校上两年，一半学习一半净干活了，进厂时工资就是三十四块五，一级工。我进厂以后老工人对咱们很关心哪，带着咱们劳动，当然主要还得靠自己。

我有个特点就是爱看书看报，爱上图书馆，虽然文化不高吧。那时候图书馆也小，但我是常客，有时间我就去。我爱看连环画，小说。那时候出来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还有《三国演义》、《水浒》，还看过抗美援朝时候的黄继光、罗盛教，反正就是什么好看什么。我感觉我的文化从毕业到六六年吧，都是自学，爱好，都是从图书馆里长的知识。报纸主要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那阵儿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没有普遍地号召呢，但是也介绍了个别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人好事，这样我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有了兴趣。

后来就是全国学习雷锋。毛主席不是有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吗？那就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了，因为雷锋同志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怎么为人民服务，怎么扶老携幼，怎么支援灾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我还记着这话呢——咱们就是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的。出了雷锋以后，铁路上又出来个叫陈

亮的，是我们东北孙家养路 2 区的青年工人，事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在我们厂展览过。

我是六四年入团的，不久车间改选团总支，我就当了团总支书记。车间有一百二三十名青年，其中七十多名共青团员。当团总支书记以前，我是全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而且经常在厂部的小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诗歌。当了书记以后，就组织青年搞义务劳动，搜集好人好事，搞卫生，擦厂房的大玻璃。六五年到六六年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发展了一部分团员。后来厂里派一个老工人支委跟我谈入党，因为入党申请书我早就写了，这个程序就是先有介绍人跟你谈话，然后再填入党志愿表。六六年初刚跟我谈话，“文化大革命”逐渐地就起来了，这就没有再进一步发展。

“文革”前我们厂子是分南北厂，两个厂子加起来七千七百多人，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厂子。一九〇一年满清末年建厂，目的就是给法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铁路做配套，他们从北京到汉口修了一条铁路，叫京汉铁路，长辛店车辆厂就是给这铁路服务，修理火车头和运货的车辆，火车头叫机车，装货的车叫车辆，所以叫机车车辆修理工厂。那时候叫修理工厂，还不能制造。一九一九年这个厂子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组织了一次赴法勤工俭学，到长辛店去过，搞过调查，调查工人的疾苦，劳动的情况。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派邓中夏来组织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工人就有了团结起来的愿望了。又组织了一个工人俱乐部。咱们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庆祝“五一”国

际劳动节，就是长辛店二七厂的工人们搞的。我们厂有本书，是钱小惠主持写作的厂史，叫《北方的红星》，都是当年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工人回忆的。解放后朱总司令还给厂子题过词呢：“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作家魏巍蹲过点儿。

“二七大罢工”时的烈士有葛树贵、吴珍（涿州人）、辛可红等人。还有一个史文彬，他是工人领袖，“二七”时没有牺牲，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委员，在一九二七年白色恐怖中被捕牺牲了。

李：是“革命传统比较深厚”的厂子。具体地说，在您的记忆中，二七厂的“文革”怎么开始的？

徐：这“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厂就像是风暴起于青萍之末一样，它是慢慢起来的，是从批判“三家村”、《海瑞罢官》起来的。我爱看报，看那些批判文章，所以比一般的工人接受得早一点。

李：是不是一开始也没反应，觉得外边的事跟咱没关系？

徐：对对，没反应。一开始就说这是文化界的事，也不怎么参与。后来就是有党组织组织了，在六六年四五月份吧。党组织布置我们共青团批判“三家村”，让老工人发言，忆苦思甜，就说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他们要恢复旧社会，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儿罪——还停留在这种地步。由市委组织，厂党委布置，支部实施，这么一套（程序），那是有组织有步骤的批判。后来就是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上面净登这署名的文章，比如我还记得有高炬啊，何明啊，他们的文章就比较尖锐了，就已经指向某些人啦。

李：您自己怎么理解这些事情的呢？

徐：我当时就想这是文艺界的事，是个思想问题，要肃清文艺界在这面对咱们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安危啊，政权的变色啊，确实没考虑这个。六月一号，聂元梓的七人大字报广播了，也登了报了，这时候厂子的群众运动就起来了，贴大字报，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表示支持。

李：这时候就是群众自发的，不是党委组织的了？

徐：哎，不是党委组织的了。那时候在我思想里就认识到，这党内有坏人，党内有黑帮。我那阵儿是团总支书记了嘛，有号召权，也有号召力，也有组织能力，对于团员来说是一呼百应。六月一号开始，这厂子里就像是一块石头扔进了一潭死水，一石激起千层浪，工人们就动起来了。那阵儿就要求上北大看大字报，可工厂不给车。

对了，那时候我们厂是清华和北大两个学校的教育基地，每逢毕业生要毕业了，就先上我们厂劳动，说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和帮助。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之前，有北大的学生在我们车间劳动（那些小姑娘小伙子跟我的岁数都差不离），聂元梓那张大字报贴完以后，他们贴了张大字报，说“工人师傅们，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爆发了，我们要回学校搞文化革命了。受到你们的教育我们很感谢，我们还是要回来的，希望工人师傅们也要积极参加这场大革命”。下边有几个学生的签名。可惜咱们那阵儿也没有录音，也没有照相。

李：二七厂从六月一号开始就逐渐的有工人自发地贴大字报了？大字报主要内容都有什么呢？

徐：有了。我就是一个人，二七厂给党委书记吴文彬贴的第一张大字报。

李：您贴了全厂的第一张大字报？

徐：啊。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了，还有几个工人兄弟。那大字报的题目叫《吴文彬你是马列主义者吗？》。是我写的。

李：主要批他的什么问题呢？

徐：那阵儿我认为吴文彬不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支持批判“三家村”，而且“包庇坏人”，所以说“你是马列主义者吗”，你不是。主要就这三条。

李：写这张大字报是受聂元梓的启发吗？直接对着顶头上司、揭发本单位的情况？

徐：是。揭发本单位的情况，再有就是好像提到“北京市委黑了”，你执行的是彭真的旧市委的路线，你要做检查，你要做交代。大字报不长，办公纸大小，就两张。

李：大字报的酝酿过程还记得吗，比如哪天、找了谁？

徐：哪天我忘记了，反正是六月一号以后不久，就那几天吧。我起草的，找的我们团总支的宣传委员赵继光（他给我修改的），沙凤权（他是我们团总支里边的），又找了几个。当时我还有这么个想法，就说也得找党总支的人，也要他们签字，结果党总支书记王金生说“我不能签，吴文彬是党委书记，我是党总支书记，我不能反他”。副书记叫王金治，他就签了字了。有这么十来个人吧，其他人我就忘记了。

李：是您去一个个地串联？

徐：就是这样。还有不敢签的，不愿意签的，有的说我们也不了解情况……

李：是签的多还是不签的多？

徐：签的多。不是在底稿上签字，是写完了在大字报上签字。把他们叫来看一看，同意的就签字。我记得有点小技巧吧，不是副书记王金治签字了吗，其他人都围着他的名字签，签成一个圆的。

李：这是不是跟电影里学的，看不出来谁带头？

徐：对对。其实我倒不怕，第一个就是我签的字，第二个才是王金治，大家围着王金治，我在边上，其实我也围着王金治哪。

李：您也围着他？

徐：还是以党的领导为主吧，以党总支副书记为主，实际上是我搞的，大家都清楚。后来就乱了，因为我们铸工车间是二七厂进大门第一个车间，地理位置很重要，工人上下班都从那儿走，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很招人，很有影响。

李：都什么反映啊？

徐：“敢给党委贴大字报？敢揪党委书记？徐铠你真有胆子！”——聂元梓都敢贴大字报，咱怎么不敢呀？其实毛主席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这个，号召大伙给党委贴大字报，提意见。咱就是说思想前进了一小段吧，要说（比）工人队伍前进多少也不多，总之还在工人队伍里边儿呢。可是贴出大字报影响可就不小了，有车间支持徐铠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像解体车间的、加工车间的。这时候厂子里就乱了。

因为已经向党委开火了，工厂就向铁道部告急，向市委告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厂子是走在运动的前边呢）。结果在六月十五号左右，铁道部就紧急派工作团进二七厂。团长是铁道部监委书记穆纯农，一个小老头，老革命，陕西人（我估计他是和刘志丹在一起的老革命）。那阵儿他就得有六十来岁，我们管他叫“穆老头儿”么。他来了以后就在俱乐部召开了“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会我没参加，可能总支书记已经对我反感了，没通知我。俱乐部在我们厂外陈庄子，工人有的参加不了啊，就上那儿去“捣乱”去，要冲击这会场，就是“不让我们参加不行”，到底听听你们说什么。这门口就乱了，穆纯农就在那儿拍桌子（我这是听说，因为我没参加），“我们在这儿开会，外边有坏分子捣乱！他妈的坏分子捣乱，我枪毙了他！”就那种老军人的态度。后来这是他一条罪状啊，说“你要枪毙谁？你要枪毙我们二七工人吗！”

工作团进来以后，我就组织一部分人开会，目的就是要向党委开火，要给党总支书记提意见，就号召工人，以青年为首吧。这个事情，工作团算我一条罪状。支部委员、工会主席范朴勇给我贴了张大字报，说我是“阴谋家、野心家”，组织七十二人的委员会，要当委员长。

李：您找了七十二个人？

徐：当时我也不知道多少人，后来有人汇报了呗。这就开始围攻，围攻我的主要是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那是党支部、党总支组织的围攻。我这边就是以我为首的共青团员，赵继光、沙凤权、史绍先、孙绶环，等等，我们就反击：你说我们是“阴谋家”、“野心家”，

我们是明着开会的，没搞阴谋，搞的是“阳谋”。

进驻车间的工作组组长就找我谈话，说我脱离党的领导，对党支部进行了攻击，要检查。我就不检查。这几个青年就找到我，说这个工作组可不对，他们自己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可他们是从哪儿过来的？我们后来知道，他们是各个工厂的中层干部集中起来的，六七十人，十万火急集中到铁道部，几天就到了二七厂了。我们车间史绍先就写了一份《工作组滚出铸工车间》的大字报，内容就是反工作组的，让我签字。我说这“滚出”可不好听，改成什么呢？我说改成“工作组是不受欢迎的人”，文明点儿——当时还注意这个问题呢。改了以后我们签字，有史绍先、我、沙凤权、赵继光、孙绶环等人，就贴出去啦。

这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工作组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你反完党委，你又反工作组，好家伙！第二天别人就又贴出大字报来了，“以徐铠为主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对毛主席！”两边就干起来了，当然不是说（真打起来了），就是贴大字报吧，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他们这大字报有个特点是什么呀？第二天早晨贴出来，黑间写，我们是属于白天写的，一来一往一个回合，你白天贴出来了，我一看就针对你这个，就又写。后来从中央到北京市下来一个指示，就是什么“大字报内外有别，不要涉及到个人的秘密”，就是档案的秘密。反正就规定了几条。那时候党员和群众就对立起来了，虽然概念上还没形成派，但双方一个是保党委的，一个是反党委的，或者说一个是反党委的，一个是在党委的指挥下反击这个

反党委的。

李：您怎么敢反了党委，又反工作组？他们是党的领导、党的化身呢，您考虑没考虑这个问题呀？

徐：考虑过。工作组不相信群众，打击群众的积极性。

李：“不相信群众”有什么具体表现呢？比如哪天开会不让群众参加，或什么材料不发给群众？或是找人谈话不找群众？

徐：他那还不是那样呢，他已经压制群众啦。我们车间工作组组长姓王，原来是南京田心机车车辆厂的一个车间主任，当时四十岁左右吧，找我谈话，说你这个团总支书记是怎么当的？你为什么要脱离党的领导？你为什么背着党组织搞活动？然后就把我下边的群众跟团员一个一个分化，一个一个谈话，说“不要再跟着徐铠跑了”。连做工作带吓，各个击破，很多人就不跟着我走了。我就孤立了。

李：这时候您心里怎么想啊？

徐：“没人跟着走了，我是不是错了？”也犯嘀咕：我可能是错了，脱离党的领导了。再说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咱们不能反哪。我就写了检查了，贴出大字报，主要意思就是说组织七十二人委员会、反对工作组都是错误的，没有经过党组织批准——横不能说自个就是黑帮是吧？那工作组组长就跟下边说“徐铠就是黑帮”。我算什么黑帮啊，彭真他们是黑帮，我怎么是黑帮了？那家伙，批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你想那是党组织组织的人写。

李：那些人里头除了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有没有平时有过节、官报私仇的？

徐：没有。我们都是—般工人，就是党组织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隔阂，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其实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不是我起草的，但我不能把这责任推给人家啊，我是团总支书记啊，应该负主要责任。我就做了检查，承认错误，但是你承认错误也不行，还围攻。

李：这时候生产秩序还正常吗？

徐：生产还是正常的。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搞文化大革命，一写完大字报就干活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李：那在您那一个组干活的工人之间关系紧张吗？

徐：有那么几个，他就不理我了，但一般的人还理我。这是什么情况呢？在一块干活，我写完大字报，要反对我的呢，我写什么你也管不着我，观点一致的呢，我写完大字报你瞧瞧，观点不一致我根本不让你瞧，是不是？

李：一般同事之间关系还融洽。

徐：还是比较融洽，大家都知道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嘛，这是组织运动并不是个人恩怨。比如互相捎个饭什么的……虽然观点不一样，但不影响人际关系。

李：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咱们是同乡、同学，观点就一致？

徐：没有。工作组整我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晚上回去，第二天早晨来，就不知道一夜有多少大字报，一进车间铺天盖地都是，主要攻击的是我，落款有的写“革命群众”，大胆点儿的就写自己的名字。

李：你们那几位现在还一块商量事儿吗？

徐：那阵儿就不敢啦，就以我为首成了“反党小集团”啦。不敢

开会了，但心相通。后来社会上那股风就吹过来了，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反工作组不是反党”。

接着就开始搞工作组“整群众黑材料”的问题。有没有“黑材料”、“黑名单”？我是亲身经历的，党总支布置的“给群众排队”，运动当中谁的表现如何。我们受党总支的指示开过一个团总支会议，给青年排队，上中下。说提到你啦，看看这个人的表现怎么样，（大家讨论）这个人还可以，运动还积极，那就算上；说他表现不好，就算下；还有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不敢参加呀，就算下。就在我们分析排队的时候，团总支内部就形成了两个观点。七个总支委员，我、陈学财（党员、副书记）、万淑慧（预备党员、组织委员）、赵继光（宣传委员）、沙凤权、郭德元、秦梦秋，基本上就分成两派，以副书记和组织委员一个观点，我们其余几个一个观点。后来才知道这排的就是“黑名单”，这是“黑材料”。

李：这期间二七厂除了您这几个是众矢之的以外，还有别的运动对象吗？

徐：因为当时各车间是各自开展的运动，也没提倡串联呢，都是听说。你比如内燃机车间（它是搞技术尖端的，所以大学毕业生比较多），有一个叫王霞丽的，可能是大连铁道学院毕业的（我们厂的大学毕业生是大连铁道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来的），家庭出身不好，就被对方抓住这点攻击，说是给她“剥画皮”，剥她出身不好，“对共产党有阶级仇恨”。当时不打人，光大字报那种铺天盖地那种形式，就压得你抬不起头来。就那大字报一贴啊，就党组织组

织的那个，第二天早晨就一大片，你看都看不过来。被围攻的那些人也被迫检查了。

李阜生（以下简称“阜”）：实际上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工作组就寿终正寝了。全会开完了工作组跑都来不及，它就撒手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想撤都撤不出去——不是造反派，是贴大字报这帮群众揪着它，它进来的时候把党委书记给打倒了吧？就是党委这帮人揪住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红八月”就来了。

徐：“八一八”以后，有一件事就是轰这些个所谓的“牛鬼蛇神”。我是团总支书记，我轰走了一个，是党总支书记给我的指示。那人叫刘某某，是我们涿州老乡，党员，和一个女的乱搞两性关系。女的丈夫是机车乘务员，不经常回来，所以他们俩就搞到一块了。他们俩在一个工具室发工具，一男一女时间长了难免，结果被车间发现了。跟他谈话，他承认了，这女的也沉不住气了，就写了揭发材料，揭发他跟她的私房话，说过“我跟你瞎搞算什么，江青还瞎搞呢”。于是就把他给逮起来了，总支书记就说得把他开除，轰出二七厂。这么着我们三个人给他押送回家。后来这人也回来了，我当造反派负责人的时候他找过我，他说我这问题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就把我开除出厂了，轰回家了，怎么办呢？我跟他说是我送你送家走的，但是是党总支指示的，这问题我自个也解决不了，得等运动后期再说了。八三四一进厂以后，他又回来了，换了车间。

“八一八”以后工作组在二七厂就开始指挥不灵了。我和沙凤权、赵继光几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是“工厂的运动冷冷清清了，

但是我们心里不服，我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们要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但是现在工厂的运动冷冷清清，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后来就什么中央首长讲话啊，什么中央接待站啊，就传过来了，我们就上接待站。保工作组的也去，反工作组的也去，工作组派的车。到接待站一看，大开眼界！人家公开的就支持反工作组，有不少学生在那儿呢。接待人员说你回去它要压制你们就反对它，压制群众是不对的。下边的学生就讲他们各自学校的情况。那阵儿还没串联呢，其实那儿就是一个串联点，交流经验的地方。

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工作团了。因为工作团进厂的五十天可不好受啊！一开始大字报围攻，分化瓦解，孤立，完了大字报再围攻，跟你谈话，让你写检查，确实压力不小——“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谁受得了这压呀？回来以后我们心里就有底了，贴大字报：反工作组不是反党，不是反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派工作组，他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的！然后各车间就公开串联了。因为我们先反对的工作组，这工作组就从我们车间真滚出去了，它就管不了了。撤了呢，它是撤到厂办那儿了，没撤出厂去，但是不敢进车间了。

这是八月底九月初吧，生产秩序还是正常。我们厂的工人就是这样，还是照样搞生产，不会说停产闹革命。一般开会呀辩论哪，贴大字报啊，都是在下班以后。党委这方面说话没人听了，但是生产指挥系统说话工人还是听的。《十六条》公布了，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坚守生产岗位嘛，咱们工人还是听党中央的。

工作团这就算瘫痪了，在工人群众中它已经失去作用了，不听它

的了。当时我们开了一次批判会，有个党员叫王永力，是受车间党总支和工作组的指挥围攻我的，他公开在大会上检查，痛哭流涕，说“我上了他们的当”。党员心里也是有怨气，你说听党组织的吧，现在又错了，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听党组织的吧，我那时候就错了，犯了“组织错误”。那阵儿在我们厂子里有这样的传言哪，就是“宁可犯路线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始终要跟党组织走。咱们现在来看，人家有组织观念，可是呢，当时这党组织是镇压群众的，他也跟着走了（当然现在说起来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错了）。就是我跟随着组织，组织错了，我也错了；组织不错，我也不错。工作组压我那阵儿我做检查，等到工作组犯错误了，党员做检查，这就叫运动的反复。

李：二七厂的红卫兵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徐：“八一八”以后，那阵儿因为毛主席都戴上红卫兵袖章了，我们也成立红卫兵。我们组织了一个叫“红卫兵钢铁战斗队”，因为我们铸工一个大车间分成两个车间，铸钢车间和铸铁车间，这两个车间组织起来就叫“钢铁战斗队”。这里头还有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是钢铁，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战斗队组织起来以后，（人数）几乎占车间百分之八十，因为车间里年轻人占大多数。

李：讲成分吗？

徐：当然讲啦。你比如郭德元，他爷爷是伪镇长叫红卫兵打死了，我们就没有敢吸收他，他也不来，这里头也是讲成分的。

我们的战斗队四百人左右吧，还分两个车间，一个车间二百多人，

但是个整体。为什么我们车间（的战斗队）这么多人呢，一个是我在里面起作用，青年为首的，又经过反工作组，舆论在先，人心所向。

组织起来以后，就从社会上传出来，说工作组有整群众“黑材料”的问题，我们就批工作组，而且也批了党总支书记，因为是党总支书记组织实施了这个排队的方案。我本人也执行过这个，我就站出来检查，向大家说明，确实是有这个给群众排队的现象，“黑名单”是我亲自参加排的。后来党总支书记上来做检查，他哭了，说自己出身贫苦，“工作组让我给排队，我就给排了队了。”大家问那材料呢？他说烧了。好多人就不同意啊，说“没烧，交出来！”后来我就说了，承认有“黑材料”就算了。你让他交出来，他也别扭，烧就烧了。群众运动都起来了，这排队的材料能起作用吗？所以他检查了两次也就不揪他了。

在这个期间有一个插曲，就是“白色恐怖”过去以后群众刚要抬头的时候，工作团就召开了批判“本厂走资派吴文彬”的大会。让吴文彬戴着高帽子，打着幡儿，幡儿上写着“三反分子吴文彬”，绕场一周。那是万人大会，连家属都参加了。通过这事说明工作团已经迫于上边的指示和下边的压力，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革命行动”吧。

批判吴文彬以后，我们厂的造反派就都起来了。我们的下一步目标是串联各车间，成立统一的群众组织。在十一月七号，巧得很，是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晚上，有我、陈德富、沙凤权、刘则玺我们几个，十几个车间的代表吧，就站在马路边儿上，商量成立造反组织，我提议叫“红色造反团”。在哪儿办公呢？就考虑到“走资派”吴文

彬住的那个大院，大院是一个欧式的房子，尖顶的，他被轰到职工宿舍去了，这房就空了，但是由工作团给锁了。我说就占他这房。我们几个人就去了，先派了一个人找工作团，工作团说“不知道钥匙在谁那儿呢”——成心。甭管他怎么着，撬门。我一脚把门给踹开，我们就进去了，宣布“红色造反团”成立。第二天就到广播站广播，广播站的小潘还不敢广播，孙绶权就问我，我说她不广播咱们自己广播。孙绶权就把小潘给轰出去了，他就广播了：“红色造反团”成立。而且有一个《通报》：各个车间造反战斗队的负责人要到造反团来报到。两三天之内，我们“红色造反团”下属的三十七个单位、科室和车间都报到了，成员一共五千多人，各自称“二七厂红色造反团某某车间造反队”，都统一名称了。像我们那“钢铁战斗队”就叫“红色造反团铸工车间造反队”。有的车间（比如动力车间）成立了两个造反队，都来报到了，都承认我们的领导，可下边还分歧呢。我就去做工作，促成他们合并成一个造反队，像毛主席说的“争取大多数”。

再就是下去支持车间的造反。有一个锅炉车间，党支部书记就不承认有“黑材料”，始终没要出来。锅炉车间造反队跟我们反映了，我就到那车间组织大会。我用我的经历现身说法，我说你给群众排没排队？他说我排了。我说你的“黑材料”在哪儿，交给谁了？他说谁也没交，“在我家房梁上呢”。大伙就说去，到他家拿去，就到他家房梁上拿下来了。这么一翻，好家伙，他把有的党员都给排成“下”了！这党员一看就哭了，“我这么跟你跑啊，你还把我排成下等了！”这群众就起来了，他那“黑材料”就当众销毁了。

还有一个是内燃机车间，总支书记叫易传创，上海人，有文化，给吴文彬当过秘书，当过团委书记。他有组织能力，把车间的党员团结在他周围，对造反派压制得很厉害。这个车间虽然有了造反队，但是还起不来，处于少数。这样我就鼓励他们，一开会我们都去支援，把总支书记、团支部书记都弄到台上叫他们交代。我带着几个人到了内燃机车间，我一去他们就说“哎呀，坏啦，徐铠来啦！”就轰动了，保守派这边就不敢言语了。我就宣布“对易传创要坚决批臭，坚决批倒，把‘黑材料’交出来”。后来这个车间通过我们的支持就起来了。

我们造反团的核心有我，有刘则玺、孙绶权（锻工车间）、钟德印（解体车间）、程旭章（煤水车间）、孙宗耀。还有北厂车间也不少呢，有刘春年、费德福、刘德银，是核心。整个造反团核心是以我为首的。

我们这造反团一成立，二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就基本上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我们说开会就开会，我们说斗谁就斗谁，没有阻力，我们的力量是不可逆转的。

李：这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徐：对对。

李：厂子里的财权、人事权这些呢？

徐：那阵儿还没说。

李：比如用钱或用车还需要厂里批，他们不敢惹你们，所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徐：对对，不敢惹我们。比如说成立造反团得有袖章啊？这得买

布啊，这资金由哪儿出啊？就由我和刘则玺找厂工会主席王瑞名，跟他谈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说王主席，我们成立了造反团，各个车间成立了造反队，每个造反者要有袖章，我们要买红布，你得批给我们点钱去买红布。他说行行。他批的。

李：“红色造反团”都做了哪些事情啊？

徐：“红色造反团”成立以后，我提议要壮大造反团的声威，发展我们造反团的势力，就要矛头指向走资派，造反派就要批判走资派。第一个“战斗任务”就是召开全厂大会，批判“走资派”吴文彬。那阵儿我们不给戴高帽子挂牌子（戴高帽子挂牌子不是我们造反派的发明，那是工作团时期干的）。第二次就让工作团向广大群众做检查，承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是全厂组织的。再就是批“执行资反路线”的王峰（厂长兼党委副书记）、丁建成（党委副书记）。总之，就是我们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领导权（实际上那阵儿也不叫“领导权”），我们左右这个工厂的运动了。

阜：其实细想起来，几个小干部轮流挨批，批了半天你说管什么用？最后人家当局长的照样当局长，你现在回过来想，简直是瞎耽误工夫。

徐：我们厂子有一个工会领导的福利工厂，就是哪些职工家庭困难，职工的家属、妻子可以来上班，都是职工家属，女工。在我们造反团成立以后，她们也组织起来了，找我，叫我支持她们。我跟刘则玺研究，这些家属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家里边她是主妇，丈夫上班，她在家料理家务，起码拿一半的主意，所以我们要支持家属造反。

她的男人如果不是咱们的观点，咱们叫她们去做工作。有这么个（想法），我就支持她们，给她们开大会。她们入厂工作时和工会有一个合同（或者“协议”），那上边有点不合理的条件，比如工伤、生病了，自己负责。这女工们就提出了意见，我就领着她们找到工会的副主席王大平，在工会那院里头，把他叫出来，也不是批斗，就质问……

李：去了多少人啊？

徐：女工有近百人吧，那院里站不下。当时我就表态，“红色造反团”支持家属造反，成立“女工造反队”，以后不许管家属叫“家属”了，叫“女工”，提高地位嘛。王大平（就说）“我们有错误改正”。有一个女工生气，把合同给撕了，王大平说“别撕别撕，这合同还可以改嘛”。

李：后来这条改了吗？

徐：也无所谓改了。就说以后家属有工伤，瞧病，都由工会负责。说这合同不等于卖身契，要这样就把自己卖给这儿了，一切伤病自己负责，工会不负责这是不行的。

“女工造反队”队长叫王俊杰，直接在我们造反团的领导下。这个组织确实对我们“红色造反团”左右二七厂的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丈夫是造反者的支持丈夫；丈夫不是造反者的，做工作，加入造反团。反对的他也不敢说话了。

这一段我们就是下车间，做工作，要“黑材料”，促使不同观点的两派都走到一块，加入“红色造反团”。其实现在想起来，这又促使大联合了。所以在二七厂来说，我们团结了全厂大多数职工，不是

非得夺权才能左右这个运动。

李：当时在厂里还有其他的造反组织吗？

徐：有。“红色造反团”成立以后，建筑车间一个姓田的（叫什么忘了，外号“田花子”，是个老工人），内燃机车间有个叫张某的(外号“张麻子”)，还有北厂的宋景龙，他们几个组织一个叫“无产阶级革命军”，是跟我们唱对台戏的，观点不一致。他们没有我们活动范围大，下边各车间有多少人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那派就是原来保工作团那底子，所以就叫“保皇派”。

李：这对台戏唱得起来吗？

徐：它唱不起来，势力太弱。再加上戚本禹六六年十一月三十号到我们厂子里来公开地支持了我们。那次会上，“无产阶级革命军”姓宋的负责人说，“二七厂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这一下就臭了——那跟中央唱对台戏了，《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都说了，“整群众的黑材料要交出来”，但他说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戚本禹没有直接批评他，但是说“整群众的材料就是‘黑材料’”，把他给否了。这一否了呢，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军”就溃不成军。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这家属造反队，因为都是妇女，文化水平也低，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把“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大牌子摘下来，给砸了。这就没了，散摊子了。

说到戚本禹这儿我插一句，讲讲戚本禹跟我的关系。都说我是戚本禹的“小爬虫”，干将。其实我原来根本不认识他。戚本禹在五九年、六零年那阵儿在我们厂呆过，我六零年进厂，听说戚本禹是中共

中央办公厅的，带了一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后，否定“三面红旗”的那些人），来劳动改造。他们蹲点在工具车间，有一个老工人叫王水，戚本禹跟王水那儿干活，叫他“王师傅”，私人关系比较好。后来戚本禹回去以后，一直跟王水有点联系，总归有个人感情的嘛。

“文化大革命”期间戚本禹一共到二七厂去过五次。第一次是六六年九月五号，那阵儿造反派还没完全得势呢，正在胶着状态，就是保工作组的呀反工作组的呀，正在混战那阵儿，戚本禹去讲了什么话了，我印象不太深。我没见着，事先也不知道他去，后来听说的。第二次就是十一月三十号，和张春桥、曹轶欧一起去的，召开了群众大会。戚本禹一去都轰动了，

李：这一次他到厂里您接待的？

徐：他也不找谁接待。

李：他通知的谁啊？

徐：谁也不通知，就这么来啦。一进厂，有的人就告我（那时候我是团长了嘛）戚本禹来啦，要召开群众大会，就在内燃机车间。我就去了。群众越来越多，大约有上千人吧。戚本禹讲完话大家要求张春桥讲话，张春桥说我是来调查研究，来听听情况的，我没有发言权。他没讲。曹轶欧说我也不讲了。散会以后我们说“请戚本禹同志捎信儿问毛主席好”。你猜他说什么？“我见不到毛主席，我给你捎不了好。”

李：您觉得这是真话还是推辞？

徐：我这么觉着是推辞，或者是“谦虚”——我这么小的人物怎么见得着毛主席呀？后来听说他当过毛主席的秘书。戚本禹在我们心目中，那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啊，是经常见到毛主席的，而且这个人发表过多少文章，很有名。

阜：法院给他（徐）的判决书上先说戚本禹，要不怎么给他挂上罪名啊？就说“徐铠在车间动员会上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戚本禹的指示’”，“戚本禹说‘他们要不交黑材料我们就加温升压’”，一下子就又和群众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激行为都联系到一块了，责任都搁到他徐铠那儿了。

徐：戚本禹讲这话是在辩论会上。孙绥权反映“我们要‘黑材料’，他也有，就是不交怎么办”？戚本禹说“不交你就开会，加温加压，给他施加压力”。哎，就这么个“加温加压”出来了。发展到下边怎么着啊，就开大会，撅着。我们没有说像起诉书说的，什么揍啊，耳朵穿孔啊，跪三角铁啊，我没叫他们那么干。下边这么干了没有？咱们也不知道。我参加的会都是让批斗对象站在前边，整群众的支部书记啊，或是主任哪（主任都少，主要就是支部书记，搞运动嘛）。

戚本禹这一支持呢，我们的势力就更大了。咱们也不否认，他当时是中央文革的嘛。至于我跟他个人的关系，不像咱们似的面对面这么谈话，一次都没有。一般都是召开会议啊接见哪，公共场合，他没个别交代过我任务。不像有些人揣摩的，什么面授机宜啊，什么封官许愿哪，没有这个。

李：咱们再接着说您这个“红色造反团”。除了厂内的这些事情，

和社会上有什么牵扯吗？

徐：那阵儿讲究大串联嘛，造反派要互相支援、互相支持。我本人没到外边去串联，搞串联到铁道部系统的是我们造反团的一个核心叫刘春年，还有康子建，在铁道部和唐山铁道学院的造反派“红旗”挂了钩。“红旗”的负责人叫郭震宇，贵州人，是学生，他们造铁道部的反。还有北京铁道学院的。跟社会有联系呢，就跟首钢，跟石电（石景山发电厂）。我们跟北京的“红造”没联系，不算他们体系的。

阜：当时到什么程度？大家都开批判大会，比如开批判谭震林的大会，大字报下边一署名：工代会，以下“二七车辆厂”、“北京汽车制造厂”……所有组织一拉一大堆，就跟现在的赞助名单似的，其实有的有关系，有的没有关系，一般的群众组织都有外援几个人，就拿着这个到那儿开大会，“给我们写上啊”，就给写上了，就这样串联了。当然也有关系比较亲密的。

徐：后来唐山铁道学院绑架了吕正操，刘春年就跟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一块，把吕正操送到我们厂来了。二七厂的招待所有专家住的地方，挺豪华的，就把吕正操搁在那儿，外边有几个人看着，以铁道学院为主。

李：那是什么时候？

徐：六六年底，我记得还冷着呢么。我们造反派核心就开会研究，有刘则玺、我，还有几个人，说这吕正操还没被打倒，他还是部长，给弄到咱们这儿来，上边要是指责怎么办呢？说这样，不能让他在咱们厂呆着，让吕正操就说是到咱们厂来视察。咱们陪着他在二七厂转

一个圈，到各个车间看一看，完了给他送通讯工厂招待所了。从这儿就证明呢我们对吕正操还是有分寸的，说是“绑架”，我们没绑架他。后来在中南海开会，我去了，周总理批评了，就说铁道部部长被绑架了，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你们谁知道？那阵儿正闹“安亭事件”，周总理说“我当了铁道部长，我这总理还得当铁道部长！赶紧让吕正操回来”。我们回来以后，铁道学院就赶紧把吕正操送回去了。在那期间，吕正操的女儿（北大的学生，跟我岁数差不离吧，现在也就六十左右），还到吕正操住的地方去看过他。

李：除了去铁道部系统串联以外，“红色造反团”在社会上还有什么大的举措吗？

徐：跟地铁机械厂串联以后（那阵儿地铁也属于铁道部），他们厂发生过一次武斗，时间是六七年二月四号。那天晚上地铁机械厂给我们厂来电话，值班的靳海江跟我们汇报了，说“地铁红旗”要求我们去支援。这地铁机械厂在永定门外宋家庄，当时“地铁红旗”是造反派，是少数派，让对立面给包围了。开始我说不去，这么远，又是黑间，哪儿找人去啊？好家伙这电话就一个接一个，就报告这武斗的严重情况（其实他们那边也夸大其辞了），说快来吧，不来我们就完啦。几个人旁边一鼓动，我说那去就去。一按直通单身宿舍的战备铃，好多人都跑出来了。找了有一百多人吧，去了有三四辆汽车。说是武斗我们也没拿着棒子，没戴安全帽。我领着去的，有家的造反团头头都回家休息了，我住单身宿舍啊，家在涿州呢。到那儿以后对方（“革造”）那人已经没啦，有人说可能跑儿童医院去了。儿童医院是他们

“革造”的联络站，追去那儿也没人。夜里谁不困谁不累呀？赶紧回厂吧。回到厂里了，就听说是缴获了人家一个大喇叭，还有一部电话，你说你弄人家电话干吗呀？拿到厂子来也没用啊？后来我听说是工具车间有一个叫孙某某的，抢了人家电话，谁还弄了高音喇叭，就是这两人。结果后来这事儿都算我的罪名。

这是一次。再一次是六七年二月九日，北京铁道学院（派头头叫张彩文）扣了唐山铁道学院的郭震宇，唐院的学生就来到了二七厂求援。当时我们就研究，也是僵持了很久，起心眼儿里跟你说不愿意去，你工厂的工人跟他们扯什么啊？后来研究，唐院跟咱们还是亲密战友嘛，郭震宇有危险，那就去吧。第一批去了一二百人，第二批也去了一二百人，也就是三四百人吧。分别由刘则玺、孙绥权带着，我始终就没去。去了以后，他们把人就给放出来了。旁边的钢铁研究院的造反派就跑去支援我们的对立面，把大门给关上了，不让我们出来，包围反包围啊。我早跟刘则玺说你速战速决，赶快回来。结果他没出来，就僵持起来了，一天一宿吧。这时候周总理就知道了，派北京卫戍区部队去。后来我们二七厂造反团的人从门口排着队灰溜溜出来的，两边是钢铁研究院的人。有部队，不许打了。回来以后群众反映很大呀，造反团的内部反映也很大。说不应该到北京铁道学院去，学生之间的问题学生自个儿去解决。钟德印就说今后再有这事情咱不去了，谁要求支援咱也不去了，咱们就搞好本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后来我就召集造反团的队长会议，在会上做了象征性的检查。

李：还有什么大的事情？

徐：对外支援的大行动就这两次。还有一次就是“自卫”了。北京铁道学院要组织人到二七厂来游行，我们听到消息了，就拉了厂子的汽笛，集合全厂的造反派，各个路口把守，不让他们进来。有人说放他们进来，放进来就揍。我说那可不行。那汽笛是上下班（用的）呀，一拉十几里（都听得见）。结果一拉汽笛工人一集合，这工人都急了，因为“二九”事件一肚子火啊，还不知道找谁算账呢，你来了就找你们出气！结果到了卢沟桥对方就都回去了，不敢进来了，因为二七厂的人都起来了，拉了汽笛了。这事没闹起来。

李：您厂内还有什么其他的恶性事件吗？

徐：厂内没有，我们没打死过人，没打伤过人。

李：就是说二七厂在“文革”开始以后到北京市成立工代会之前，一个非正常死亡的都没有？

徐：没有。伤残的也没有。

李：您说说本厂夺权是怎么回事吧？

徐：六七年一月十九号的晚上，钟德印等几个人从人大会堂开会回来找的我，就说咱们得夺权。我主张联合夺权。那阵儿二七厂还有两个造反派组织，一个叫“红旗协会”，一个叫“红旗兵团”，都是反工作组的。“红旗协会”是以机关、科室的知识分子为主，“红旗兵团”纯粹是复转军人。钟德印说咱们先夺权。我说那今儿也晚了，咱们先研究一下，明天夺权。二十号早晨在北门口召开了群众大会，我们就呼口号：“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然后各个科室各个车间宣布当权派下台，全部由本单位“红色造反派”接管，成立“革命

群众接管委员会”。全厂夺权就夺的是厂部的权，财务科的权，保卫科的权，武装部的权，就这四个。财务科属于厂部，是孙绶权去的。我是夺保卫科、武装部的权。那政治部啊组织部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就占在那儿了，也无所谓夺了。

宣布夺权以后，我带了四五个人先夺了保卫科的权。见着保卫科长，我说“今天告诉你说啊，宣布夺你的权，你把公章交出来，把档案材料封好，我们检查，还有没有‘黑材料’你都交出来”。保卫科长说夺权我们支持，给你这章，但是档案你们不能动，地下室有保密的文件，还有枪支。后来我就找了两个党员，把地下室给打开了，一看里头有点枪，大枪，三八式，民兵练习时候（用）的，没子弹。翻了翻档案，还是“反右”时候的材料呢。没动。又把地下室关上了，我们就上来了。地下室钥匙还是保卫科那儿保存，保卫科长留用，因为咱们不懂这块儿业务。大印就到了我们手里了，但是也不会用。

然后就是夺武装部的权。武装部长叫王福德，是个老八路，组织观念很强，不敢给我钥匙。我就跟他说“造反派现在要夺权，你就交权”。王福德也不说交也不说不交，拿着钥匙在手里这么摇晃，那意思我递给你，我也不好意思，你夺我的就行了。我说“你拿过来吧！”一伸手，这就把钥匙夺过来啦。后来就宣布是谁在武装部，你听从指挥啊。这权就夺了。后来保卫科长和武装部长就让他们自己找合适的车间劳动去了。因为他们也没什么事，下边那些科员还留着用，因为他们熟悉业务嘛。这总归就说我们是象征性夺权。

李：您派去的人说话灵吗？

徐：灵啊，那都得听他的了。

李：这个时候负责人都是您派去的，但是这些人不懂业务，业务主要还是靠原来的人，而且实际上规章制度一点都没变？

徐：对对。就我们掌权那阵儿，一直到二月底三月初吧，空军来了五个人，叫军管会（后来听说来之前戚本禹跟他们谈话了）。起初很害怕啊，说咱们犯什么错误了，怎么实行“军事管制”啊？那名声不好听啊。我说咱们看看去。我们到了军管会，军管会的主任自我介绍说“我叫王素”，还有魏同阁、王俊、余满江，还有一个姓金的，像他们的秘书，年轻，二十多岁，一共五个。他们说奉上级指示，提到北京卫戍区（说没说“三支两军办公室”我忘了），说“卫戍区派我们到二七厂来实行军事管制，但是我们要做调查研究，我们支持造反派，希望你们配合”。我就简单地讲了讲二七厂的形势，“我们现在夺权了，各个单位都在我们的领导下，我们支持军管会的工作，服从军管会的领导”。当时下班以后有不少人找军管会反映情况，包括被压下去的对立面，我们就知道了，不管了。

过了没多少日子，军管会就通知在体育场召开全厂大会，公开宣布二七厂“红色造反团”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造反团。至于有些小缺点是能够克服的，希望广大群众、造反派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大家就鼓掌。他们都公开支持造反团了，那造反团的地位更有利了，

阜：这就叫犯了“支派不支左”的错误。

徐：其实毛主席说要支持左派，支持造反派，那所谓的“支派不

支左”，谁是左啊？

李：这个时候你们跟军管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徐：是密切的。

李：军管会让你们交权了？

徐：没交。他们一共才五个人，也管不过来。他说你还搞你的生产。别的没有什么大的活动

阜：就是你管生产，他管你，就是这么个关系。

徐：对对，他就坐阵。其实就是说他宣布了支持造反派，支持“红色造反团”，这厂里的形势也稳定了，

李：造反团的地位也稳定了。实际上他也没有更多事可做？

徐：对对，他要不做也行，可是他就到下边搞调查研究，到各车间串一串，搜集点材料，是不是跟上级汇报就不知道了。他们是二月底三月初军管的嘛，我三月二十四号就到了北京市工代会了。

李：这一段您还是照常在铸工车间上班？

徐：对。

李：“红色造反团”的办公地点得有人办公啊？

徐：造反团占的是原来吴文彬的住宅，一层。有两大间吧，大概一百平米，开始也没电话（他走了以后这电话就掐了），后来跟电话局联系，接了一部电话。在那儿接电话的叫靳海江，工具车间的。另外政治部直属造反团，那边有电话，政治部有个老党员庄辛金，参加过土地改革的，老区来的人，老游击队员，进厂以后入的党。我们这个造反团，当时就是两个工作人员值班。经常到那儿去的人不少，造

反团就是中心嘛，我是经常挨那儿呆着，再就是刘则玺。那儿也没什么办公家具，就是桌子、板凳儿，别的就有一部电话，有一个壁橱，我记得司机值班在里睡觉。

李：那办公费怎么解决啊？比如笔、墨、纸？

徐：总务科去领。总务科负责的是我们车间我派出去的，第一任是沙凤权，第二任是刘华文。其实还是按部就班，他们以前什么系统，该怎么领还怎么领，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你比如说这领纸，那就是从总务科领，总务科没纸了，告诉财务科开支票，还是材料科他们去买，买回来以后发到下边。

李：从“文革”开始到您进工代会之前，厂里各级领导是不是基本“靠边站”了？党委书记、厂长、总支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等等。

徐：我们厂部这些领导，除了年老体弱的，都是他们下去自己找车间劳动。原来他们也有定点车间，干部参加劳动早就提出来的。你像团委书记是加工车间的车工，他就回加工车间劳动去了。厂长王峰就没下去，还跟着一块儿指挥生产。生产这一部分没动，党委这一部分就下去了，吴文彬就扫大街了，也不关着不押着的，他自己劳动。各支部书记也下去劳动了，管生产的主任、副主任基本没动，该干什么干什么。

李：他们听造反派的吗？

徐：听啊。造反派有一个“群众接管委员会”，各车间都有。厂里的叫造反团，在厂部生产这一块呢，叫“群众生产监督委员会”，

监督原来厂部指挥生产这拨人。

李：怎么监督呢？比如下面的报告他们都拿过来看看，哪儿要拉闸哪儿要供料？这都看吗？

徐：这都得经过我们造反团的代表孙绶权，厂长签字，孙绶权也得签字。像政治这方面就无所谓签字不签字了，没有签字了。

李：监督的和被监督的有没有发生矛盾的时候？

徐：没有没有，我没听说过有这种反映。

李：在那个阶段，所谓“群众夺权”，接管工厂，斗了“走资派”以后，到底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这“文革”是不是颠覆了原来的体制？和“文革”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双方相处这么“和谐”，什么冲突都没有……

徐：有些大事他们得通过造反团同意啊，不同意他执行不了，造反派也不干。夺权体现在哪儿呢，就体现在群众——造反团说了算。

李：造反团怎么表态根据什么呢？那些具体事没有管理经验也很难表态啊？

徐：一般的生产这方面的还是以他们为主，造反团知道就行了，这就体现了造反团夺权嘛。这生产不能乱哪，你要瞎弄哪行啊？共产党四八年那阵儿进来以后，也是留着那些人用啊，慢慢才提拔工人干部上去。作为咱们来说，什么都不懂这是实际情况，你不能上来以后把生产给打乱了。我们这秩序始终是这样。后来有人向戚本禹报告说我们二七厂夺权以后贷款多少多少。戚本禹就来了，专门找我们几个谈二七厂的生产问题。戚本禹说有人反映说你们二七厂靠贷款开支，

我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孙绶权没在，我说我问一问，坚决把这个贷款还回去，生产还照样进行。

我们厂从“二九事件”以后，再没有参与社会上的打斗，生产基本稳定，工人们照常上下班。我本人呢，三月份以后逐渐就以北京市工代会的工作为主了，这个咱们下面说。

人物简介：

徐锐，河北涿州人。1943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铁道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技工学校，分配到该厂铸工车间。“文革”中成为该厂“红色造反团”主要负责人，后任北京市工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3月至1972年12月，在本厂作为“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后以“反革命分子”结论下放车间监督劳动。1978年12月，按“反革命罪”批捕，判刑七年。2009年去世。

李阜生，辽宁阜新人。1939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市煤气热力公司专业学习班，分配到公司业务科。1959年调入北京市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文革”中，成为该公司“红旗造反团”负责人，后任北京市工代会委员。